

革命、民主與國家認同

周保松

張玉法教授為了這次「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」，一早已準備好一篇長逾四萬字的文章^①，對台灣民主發展做了全面回顧，一方面評價歷任總統在推動民主上的功過得失，另一方面也對台灣民主轉型出現的種種問題作出深切反思。我讀之再三，收穫甚多。

以我理解，張教授的文章有個基本的敘事框架，就如他的文章題目所說，台灣民主化有個從「革命民主」轉型到「民主革命」的過程，前一階段由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擔任總統起，一直到1980年代末蔣經國逝世止；後一階段則由李登輝一手策動，利用民主修憲的方式，「除去中華民國的大法統，在台灣建立小法統，並放棄國民黨的革命使命，完全改變了中華民國的本質」，一直延續到陳水扁時期。

張教授認為，李登輝一方面結束了威權時代的革命民主，另一方面也在鼓勵台獨運動，促成政黨輪替，導致台灣民主政治出現國家認同危機，因為民進黨不僅要取得政權，更要革掉中華民國的命，而這背離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，就是「反對黨必須對國家忠誠，不能以消滅國家為目的。如果是消滅國家為目的，那就是革命黨，不是民主政黨」。沒有國家認同，台灣的政黨政治遂陷入無休止的族群撕裂和敵國惡鬥，難以找到求同存異的基礎。張教授認為，台灣民主政治要走出這個危機，要麼齊心重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，要麼盡快建立台灣國。

由此可見，兩種革命論及國家認同說，構成了張教授理解和評價台灣民主發展的主軸。這個分析框架很重要，牽涉的問題很多，我在這裏只集中探討三個問題。第一，蔣介石的革命民主論，在甚麼意義上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奠下基礎^②？第二，李登輝的民主革命論，在甚麼意義上導致台灣的國家認同危機？第三，台灣人民有可能以民主的方式，重建張教授所期望的國家認同嗎？



周保松教授(資料圖片)

一 革命民主論如何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奠下基礎？

先談第一個問題。張教授認為，蔣介石推行的憲政，可稱之為「革命民主」，因為他「一方面要革命，另一方面還要實行民主」，所以是兩條腿走路。這裏所說的「革命」，是指蔣介石一直視國民黨為革命政黨，而革命的目標是光復大陸，以武力統一中國。但革命和民主是不相容的，因為民主意味着多黨政治和開放選舉，而這必然會威脅到國民黨的絕對領導。因此，頒布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》和《戒嚴法》，並藉此嚴格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、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，嚴厲鎮壓黨外人士參與政治的權利，都使得台灣人民長期活在威權統治之下。蔣介石更是不顧許多人的反對，連任五屆總統，直至1975年病逝。

問題是，這種以革命之名實行的威權統治，到底在甚麼意義上有民主成份，因此可稱為「革命民主」？張教授似乎認為，那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台灣並非全面專制，而是在地區層面推行地方自治，縣市長及各級民意機構皆由選舉產生。而這種有限度的民主，為日後台灣的全面民主化奠下重要基礎。

這種解釋雖有一定道理，我們仍然可以追問：假定蔣介石是真心相信民主，而革命是必要手段去統一中國，這也難以解釋為甚麼必須以反民主、反自由的方式來統治台灣。例如我們不能說，因為革命尚未成功，所以統治者必須無限期維持威權管治，因為這兩者沒有必然關係。

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問：如果民主是好的，那麼逐步開放黨禁，容許人民有平等的權利去選舉總統及國會，真正實現主權在民，不是更有機會令台灣變得更團結，爭取到更多支持，革命也因而更有機會成功嗎？

這並非天方夜譚，因為後來蔣經國提出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，並解除戒嚴，開放黨禁報禁，便得到大部分台灣人的支持，更沒有導致社會混亂。我

們有理由相信，蔣介石不這樣做，不一定就是時局使然，更可能是他並不真的相信民主，更不相信台灣人民，因此必須用不民主的方式，將權力牢牢掌握在他及國民黨手中。如果是這樣，革命民主中的「民主」，不僅須讓位於「革命」，同時革命的最終目的也不見得就是民主。

如果這種解讀有一定道理，那麼從民主轉型的角度看，從蔣介石到李登輝，確實經歷了一場革命性的範式轉移 (paradigm shift)，即通過修改憲法及制度改革，將台灣從一黨專制和平轉型為多黨民主。它之所以被視為革命性，恰恰是因為轉型前後的制度有着根本的差異，而不是一種循序漸進的自然過渡。

二 民主革命論如何導致台灣的國家認同危機？

上述轉型過程，張教授稱之為「民主革命」：「在李登輝主政時期，以民主的方式修改憲法，除去中華民國的大法統，在台灣建立小法統，並放棄國民黨的革命使命，完全改變了中華民國的本質，我稱之為『民主革命』。」以我理解，張教授這裏所說的「民主革命」，與李登輝引以為豪的「寧靜革命」，雖然指涉同一個歷史事件，內涵卻頗有不同^③。

「寧靜革命」所指的，其實是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民主。具體而言，它是指李登輝在1990年代以一連串修憲的方式，先是全面改選國民大會和立法委員，繼而將總統改為全民直選，並在1996年舉行首次總統大選。寧靜是手段，革命的目標是民主。正因為此，李登輝才會有「台灣民主之父」之稱。

而張教授所說的「民主革命」，更多是指李登輝以民主的方式，將國民黨由蔣介石的「革命民主政黨」改為「民主政黨」，同時通過修憲放棄大中國法統，將中華民國變為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」；又或更直白一點，變為以「新台灣人」為政治主體的「台灣國」。換言之，民主是手段，革命的目標是台灣獨立^④。

張教授或會回應，這樣的區分其實沒有必要，因為李登輝的民主化和台灣化是同一回事，是一個錢幣的兩面。換言之，要推動民主轉型，便必須「去中國化」，並努力爭取台灣人的選票。事實上，張教授正是持有這樣的觀點，例如他說：「李登輝主政時期將中華民國台灣化，也使國民黨的政權落於更台灣化的民進黨之手，這是台灣民主化的一個結果，因為民主政治是以選舉決定誰出來管理政治，選民傾向於選舉本土人士，選民也希望他所選舉的領導人照顧本土利益。」^⑤

這個觀點十分重要。因為這實際上意味着，只要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決定放棄光復大陸，扎根台灣，並願意開放黨禁和容許多黨競爭，那麼民進黨的出現以至國民黨的本土化，便是必然的趨勢，而這和民主政治的內部邏輯相關。為甚麼？因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還政於民，人人平等，不同政黨在公平的競爭條件下，全力通過選舉來爭取人民支持。人民會支持誰？自然是那些能夠反映及代表他們的理念和利益，並得到他們認同的政黨。

在台灣的歷史語境下，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來說，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外來政權，更是長期剝奪他們政治權利和基本自由的壓迫者。所以一旦開放黨禁，民進黨自然會傾盡全力建構新的國家認同，並通過各種論述將國民黨和外省人標籤為敵人和他者，藉此爭取本省人的支持。李登輝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要完成他的革命大計，不僅要在國民黨內部逐步瓦解舊勢力、舊觀念和舊體制，同時也須暗暗扶持一個以台灣為本位的政黨來與國民黨競爭，促成政黨輪替。這個「台灣本位」必然和原來的「中國本位」產生巨大的矛盾和張力，並導致極為嚴重的內部撕裂。

由此便可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，即在民主化必然導致本土化的大背景下，李登輝的民主革命確實會導致一場極為深刻的國家認同危機。這場危機不可謂不驚心動魄，不可謂不充滿歷史悲情，只是當故事徐徐落幕，而我們又能從一定的歷史距離回望時，也許不得不承認，這樣的發展其實有它的歷史必然性，而非李登輝一人自導自演的台獨劇。所謂「必然性」，是指台灣的民主化必須要有相應的台灣人的主體性，而這個主體性是台灣人公民身份的基礎。當然，這裏不是要否定李登輝的歷史作用和歷史責任，而是指出他的許多決定背後，其實有個歷史脈絡在影響和約束他的行動。

三 台灣民主政治有可能走出國家認同危機嗎？

最後，讓我們回到張教授最為關心的問題，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到今天，有可能走出國家認同危機嗎？張教授認為，一國之內的民主政治，無論



四位講者一起參與圓桌討論。(資料圖片)

所持立場為何，都必須對國家本身忠誠，否則「兩黨對國家的認同相差太巨，換一個執政黨，就好像換一個國家，兩個國家輪流治理台灣」。他認為這是台灣亂局的根源所在。要走出這個困局，要麼重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，要麼走向台灣獨立建國，否則只會陷入無日無之的敵國惡鬥的局面。以我理解，這裏所說的「忠誠」，主要是對國家基本制度的認可和服從，而這個基本制度由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界定。

這個問題確實十分棘手，而且成為台灣政治不穩定之源，因為民進黨的黨綱中有「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訂新憲法的主張」的說法——儘管自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起，民進黨已積極嘗試修正這條黨綱與《中華民國憲法》之間的張力^⑥。例如在2004年總統大選後，民進黨便發表〈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〉，其中第六條聲稱：「中華民國主權既屬於全體台灣人民，而非其他政權，則台灣認同與中華民國認同，都是對國家認同的表達方式，不應被曲解為族群對立，而應相互尊重、理解和接納。」^⑦因此在政黨輪替開始後，兩種國家認同的對立雖然引起各種內外爭議，但迄今為止並沒有引發真正的憲政危機。

除此之外，基於以下理由，我甚至認為張教授所擔憂的國家認同危機，將會在台灣的民主實踐過程中，逐步得到緩和甚至解決：

第一，隨着時間過去，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必然愈來愈多，客觀上會逐步消滅外省人和本省人在國家認同上的對立。對新一代來說，即使他們不是「天然獨」，認同的也必然是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」，而和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政治主權的關係。在這樣的共識下，他們選擇支持哪個政黨，考量的很可能就不再是國家認同問題，而是更具體、更在地的經濟、文化和社會議題，也就是正常國家之下的選舉政治。觀察近年的台灣選舉，這種趨勢已相當明顯。換言之，無論是民進黨、國民黨以至一般選民，基本上都已接受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樣的事實（雖然理解和稱呼會不一樣）。既然如此，有關國家忠誠問題，便不見得會繼續成為台灣內部政治危機的關鍵原因。

第二，如果沒有所謂「中國因素」，國家認同問題很可能早已隨着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而得到解決，例如以全民公投的方式決定台灣的國家身份。目前的困局，相當程度上不是台灣民主政治本身所導致，也非台灣單方面能夠解決，而是直接受到海峽兩岸的關係影響。這個外部因素不改變，台灣的主權和安全問題便無法得到解決，因此必然帶來台灣內部無休止的爭論。換言之，國家認同的困局，外因的影響會愈來愈大於內因。這樣的結果會否反過來使得台灣人更加團結，從而形成更強的台灣主體認同？這值得我們繼續觀察下去。

最後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民主政治雖有劇烈的黨派競爭的一面，同時也有在實踐過程中促成公民團結的一面，而團結的基礎往往是共同的公民身份，以及這個身份所承載的政治價值，包括自由和權利、平等和正義，多元寬容以至對人的自主性的尊重。一個民主政體發展得愈成熟，這些價值便愈能扎

根於其公共文化，從而愈能得到公民的廣泛認同，並成為社會統一的基礎。面對今天台灣民主政治的各種亂象，也許這種說法顯得過於理想化，但我們的確得問下去：如果公民之間不能共享一些基本的政治價值，並逐步體現和實踐於制度和文化的話，那麼一個民主政體社會團結的基礎是甚麼？我這樣說，並非說事實已是如此，而是說這是一個可以通過共同學習來慢慢趨近的目標。

四 小結

綜上所述，當我們談論國家認同時，便不應僅僅停留在名號之爭，而是必須追問下去：認同國家的甚麼？對民主國家的公民來說，自然是認同民主的理念本身。民主的理念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在一個共同的政治社群實踐集體自治。一旦承認和接受這點，台灣人民的民主實踐，也就是在不斷地建構和尋找台灣的共同性，並以此為基礎去好好經營這個得來不易的民主政體的過程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，而這有賴於無數台灣人的共同努力。我相信，台灣的民主故事仍然遠未結束，更好的還在前面。

註釋

- ① 參見張玉法：〈從革命民主到民主革命——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與轉變〉，未刊(2018)，下引簡稱「完整版」。以下引文如無特別註明，則出自演講內容。
- ② 「儘管史學家對蔣介石統治台灣的評價不一，他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則是事實。」參見完整版，第二節。
- ③ 張教授在他的完整版文章中，則將兩者視為同一回事。例如他說：「李登輝將原以全中國為範圍的總統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改為由台、澎、金、馬地區的選舉，費時約只一年，全部完成。這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大工程，李登輝引用外國學者的說法，稱之為『寧靜革命』。這確是一場不用武力、以民主的方式所完成的一次大革命，可稱之為『民主革命』，即是以民主的方式實行革命，前此國民黨所實行的『革命民主』，則是在追求革命目標中實行民主。」參見完整版，第四節。
- ④ 例如：「李登輝像民進黨的許多領袖一樣，是以民主化為手段從事台獨革命，在這種情形下，首要確保台灣的安全，次為切斷台灣與大陸的紐帶。」參見完整版，第四節。
- ⑤ 參見完整版，第四節。
- ⑥ 台獨黨綱由林濁水起草，在1991年民進黨的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。不過，自1999年陳水扁準備參加2000年的總統大選始，為免出現既主張台獨，卻又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矛盾局面，民進黨內部對這個黨綱已作過不少修正，包括1999年的〈台灣前途決議文〉、2004年的〈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〉和2007年的〈正常國家決議文〉。到2014年，甚至有黨代表聯署要求凍結台獨黨綱。
- ⑦ 〈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〉(2004年9月26日)，民主進步黨網，www.dpp.org.tw/media/contents/1407。